



● 骆驼丛书

LUOTUO
CONGSHU

千秋崖借吾妻镜

钟叔河·著

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千秋崖借吾妻鏡

钟叔河·著

千秋鉴借吾妻镜

钟叔河 著

责任编辑：台 示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1,000 印张：10.125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109·2014 定价：1.45元

湘人：85—14



鍾叔河

序

《走向世界丛书》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过二十种，收入本册中的文字，就是我1980—81年间为它们写的前言，平均一个月一篇。因为都是急就章，拙劣粗糙，自不能免。好在我从未冒称作家，这些亦不算作品，也许得以逃过文艺批评的检查和监督，亦未可知。

最早主张印这丛书的是李普同志。他1981年“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时，给我写了封回页的信，说：“我很想鼓励你干这件事，如何？”并表示书可交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时隔四年，今年十一月二日，李一氓同志又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在给我的信中提

作者手迹

李一氓序

中国自成为一个国家以来，就朝代而论，只有汉唐两代最为开放，最具有世界性，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力量充满自信，不搞锁国主义。所以“汉”成为我们民族的族称，而“唐”亦为汉族之异名，直到现在。其它的朝代，如宋、明、清则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出息不大。明代初年“三宝太监下西洋”，不论其动机如何，总还算是从海洋上走出了中国的大门，显示了当时在造船航海技术上的成就，可是在炫耀了一阵“威风”之后，就偃旗息鼓了。至如其他朝代，三国、晋、南北朝、元，则另是一种情况，为自身的纷乱困扰，就说不上什么开放和封闭了。史书著录了汉代张骞、班超这些人远至异域的亲身见闻；唐玄奘游学印度后写了《大唐西域记》；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写了《瀛涯胜览》，费信写了《星槎胜览》，巩珍写了《西洋蕃国志》；他们的活动记载，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知道除了长安、洛阳、北京以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

可惜这些前人的著作和活动，没有能够激发起后代中国人追求这个辉煌事业的勇气和胆量。同时一些眼光短浅的封建统治者，也把出海出边视为妄行邪举，发布禁令并设置种种障碍。以致徐霞客这样伟大的旅行家，也只能在云南境内艰难地转来转去。这种情形，在清代更甚。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那些“暎夷”、“红毛”、“罗刹”，已经以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列强的面貌，出现在我国的周围，对我实行炮舰政策，而我却仍然自居为天朝上国，把他们视同匈奴、吐蕃、契丹、鲜卑……一样。所以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只好被动挨打，落得赔款割地的下场。闭关锁国之祸，至此而极。

清代后期，不得不打开大门，接触西方世界。一批政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如志刚、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等；一批考察外国政治、法律的专使，如戴鸿慈、载泽等；一批政治流亡人士和旅行家，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都先后到了西欧各国和美洲各国，也包括日本。他们在接触轮船、火车、机械之外，还看见了巴力门（国会）、鲁哇（罗浮宫）、单纯（跳舞）……。虽然这批人多数是洋务派——从办“夷务”到办“洋务”，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少数是改良主义者，但都多多少少意识到这个中国之所以积弱之故。西欧不仅有奇器淫巧，而且还别有立国之道。解放了

的巴黎巴士底狱和放在纽约港前的自由神，不能不在他们的思想上引起震动。可是“上国天朝”的阴魂不散，承认西学为用的同时，还一定要配上一个以孔老二为招牌的中学为体。即西学为用也没有完全接受，以郭嵩焘之高明，还反对修铁路，以康有为之迂顽，自然就更反对法国式的革命了。

这些人都在东西洋游历、考察、从事外交活动之后，留下各种著作，记述翔实，态度认真。这在当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现在看来，也具极大的历史价值。因为，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的社会变革不得不缓慢而痛苦地前进的记录。

钟叔河同志以远大的眼光，孜孜不倦，搜集一八四〇到一九一一的七十年间的这类著述约百种，编为《走向世界丛书》，现已出齐第一辑，计三十余种，十大巨册，这是近年出版界一巨大业绩。叔河同志在主编此丛书时，费力既勤且精：凡重要段落都在书页旁加注要点，每种书后又增附《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对原书人名、地名的异译都加注原文和今译：两者都是麻烦费力的笨功夫，实堪佩服。特别是他在每种书前，还精心撰写了一篇对作者及其著作的详尽的评论。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在这方面，推

而广之，可称为整理古籍的模范。

不知对不对，我总觉得，搞改革的、搞近代史的、搞古籍整理的，对这部丛书，都注意得不够。因此我更希望叔河同志猛志勇进，不半途而废，把其他六十几种，分为第二第三辑，继续整理出来，继续印行，不胜企盼之至！

湖南人民出版社集《走向世界丛书》各书前叔河同志所撰之叙论为一辑，裁篇别行，以便读者，征序于余，故乐为之略加论列如此。

李一氓序，时一九八六年元宵。

作者自序

《走向世界丛书》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过二十种，收入本册中的文字，就是我1980—81年间为它们写的前言，平均一个月一篇。因为都是急就章，拙劣粗糙，自不能免。好在我既未冒称作家，这些亦不算作品，也许得以逃过文艺批评家的检查和督责，亦未可知。

最早主张印这本书的是李普同志。他1981年“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时，给我写了封四页的信，说：“我很想鼓动你干这件事，如何？”并表示书可交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时隔四年，今年十一月二日，李一氓同志又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在给我的信中说：“（丛书）每册内各篇你的前言，集合起来印为一册，尤便翻阅，未审尊意如何？”

两位李老的两个如何，终于使我下了决心。正好朱正同志在计划《骆驼丛书》，说是除了文艺类的书稿以外，还准备容纳一点别的内容，想把这册前言集也拉去充数，这在我当然是受宠若惊

的了。

霜红龛云：“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仁义之事，实羞道之。”我也想鹦鹉学舌，来一句套话：“鄙人学历史者也，于此间文艺之事，实羞道之。”此非诙谐，而是不折不扣的老实话。因为自己不懂文艺，在庄严的文学殿堂前，自然羞得抬不起头，更不敢信手涂抹了。骆驼的主人能于文艺之外，采及菲莠，教我如何不伸着脖子让他拉呢？是为序。

钟叔河 1985.11.27夜

〔附记〕“千秋鉴借吾妻镜”是黄遵宪的一句诗，意为借日本史事作为千秋的鉴戒。《吾妻镜》，日本古史名。日本古称关东地区为吾妻（媛）国，《吾妻镜》即关东通鉴之意。（传说日本武尊皇子东征渡海，风涛大作，有橘姬投海涛神得止。及凯旋，皇子东望叹曰：“吾妻独不能归乎！”后人遂称关东为吾妻国。）集中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前言以此作为标题，今即以篇名作为书名。

目 录

李一氓序	1
作者自序	1
两千年岁月，五万里行程	1
远东人对泰西的第一印象	15
在第一面飞舞着的龙旗下	31
一个同文馆学生的观察	50
巴黎公社的目击者	69
为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	86
曾经沧海，放眼全球	101
一卷西洋风俗图	127
一位技术专家走过的道路	144
最早的世界博览会游记	162
“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	171
“待凭口舌巩河山”	192
主张开放是为了进步	208
“老来失计亲豺虎”	225
走遍世界去“尝百草”的人	247

“海云凝望转低迷”·····	261
从闺房到广大的世界·····	277
“千秋鉴借《吾妻镜》”·····	295

两千年岁月，五万里行程

从《大宛列传》到《乘槎笔记》

哥伦布以前，海洋环绕的亚欧大陆，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中国在极东，欧洲在极西，隔开五万余里；相互而言，都是“远在天边”的“世界的尽头”。

那时候，在世界上旅行是不容易的。庄子写《逍遥游》，描写鲲鹏变化，“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真是汪洋恣肆，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是，当笔锋转向人间世时，连他也不能不如实地承认：“适百里者宿舂粮（去百里外的地方，得在先天晚上预备干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去千里外的地方，得带上三个月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出门旅行的实际情形。

然而，人决不会永远甘心受局限。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世界变得宽大一些、丰富一些，希望能够了解别处的生活，得到别处的经验。于是，随着贸易和财富、国家和权力的出现，就有了长途转运的商人，有了交通联络的使者，有了走向世界的旅行家，也有了对于远方外国的好奇和希

望。

关于西方世界的情形，中国在远古就有过不少传说，如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之类。可靠的史料，至少可以上溯两千年。但直到一百几十年前，才有人亲自到欧洲记下自己直接观察的结果，——这就是《乘槎笔记》和《海录》，在此处合印为一册的两部书。

*

《海录》由一位盲人于1820年口述，经别人笔录整理而成。《乘槎笔记》则是1866年开始到欧洲游历的人的日记。论出世，《海录》在《乘槎笔记》之前；论内容，《乘槎笔记》却在《海录》之上。

《海录》的口述者谢清高，广东嘉庆州（今梅县）人，年轻时在海上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后，留在船上工作。此后十四年中，他遍历南洋、印度和欧洲；后来回国，不幸失明，在澳门以口译为生。他的乡人杨炳南，听到他所谈海外各国的事情，多为过去书籍所未载，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将其记录整理成书，刊行于世。此次据《海山仙馆丛书》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两本校勘，酌予分节标题，并重订目录。

《乘槎笔记》的作者斌椿，是一位年老的读书人。他出身汉军旗，当过知县，能文能诗，关心时事，跟地理学家徐继畲、大数学家李善兰等是

朋友。同治三年，他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属“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请去“办理文案”，开始接触洋务、洋人。同治五年，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需要一位“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六十三岁的斌椿担任了这个差使，“身之所至，目之所见，排日记之”，后来整理刻印，以《乘槎笔记》书名传世。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宫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完全保持原貌，只增加了月份标题和目录。

在《海录》和《乘槎笔记》之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全部得自传闻，从来没有过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这两部书一前一后，跟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不过二十年，正值中国人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惊起，开始面对剧烈变化的世界之时。它们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又一块里程碑。

经过了两千年岁月，才终于从东头走到西头，走完这五万馀里行程；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一条漫长的道路。

*

中国人最早得到的西方的信息，记在司马迁（公元前145—86?年）的《史记·大宛列传》里。书

中说，汉朝向西方派出的使者，最远曾到达罗马帝国亚洲属地的东陲；接着安息（今伊朗）使者随汉使来中国，又带来了“黎轩善眩人”（罗马的表演魔术的艺人）。据杜佑《通典》记载，艺人共有二位，“皆蹙眉峭鼻，乱髮拳鬚”（粗眉毛，高鼻子，卷曲的头髮胡鬚），无疑是欧洲人。

欧洲古时称中国为“赛里斯”（希腊文Enpes，拉丁文Seres）。这个名称是从“丝”字派生出来的，因为中国是产丝之国。罗马学者白里内（公元23—79年）的《博物志》说：“赛里斯人林中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由大地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可见早在二千年前，中国和欧洲之间就已经有了一条“丝绸之路”。中国商人并未到过罗马，却频繁地接触着从事贩运的中亚和西亚的“胡商”。在这条路上来往的商人和使者，把辗转传闻的一些消息带到了东方，比如：

大秦国贡花蹄牛，其色驳，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迹在石上，皆如花形……（《别国洞冥记》）

大秦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宫室皆以水精（晶）为柱，……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后汉书·西域传》）